

中国历史研究

路海泉 编著

中国民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研究/路海泉编著.

—北京:中国民艺出版社,2006.11

ISBN 7-8862-0889-7

. 中... . 路... . 史评 - 中国 - 文集

.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2319 号

中国民艺出版社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路 123 号 100086)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施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05 字数:208.3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000 册

ISBN 7-8862-0889-7/K·49

定价:17.00 元

目 录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1
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8
纷繁复杂的人类演化图景.....	12
从图腾到祖宗.....	17
龙骨坡文化.....	23
蚩尤分析.....	30
夏代年代学研究.....	33
商代前期的年代学研究.....	35
商代后期的年代学研究.....	37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考古考察.....	40
武王伐纣的正确日期.....	45
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51
西周年代学研究.....	54
酬“断代工程”初遂.....	56
老子生态哲学的逻辑体系.....	63
陇右文化圈的形成与陇右文化特征.....	65
秦直道及其兴废历程.....	69
文化史视野中的盗墓故事.....	74
汉字的演变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	82
寒山生卒年新考.....	84
《越绝书》出自谁手.....	96
中国古代城市经济发展特征.....	98
突厥源出塞人小考.....	100
三星堆遗址大事记.....	103

三星堆遗址大事记	106
三星堆浮现七大千古之谜	108
三星堆研究史上的三个重要时期	109
淮河上游八千年前的辉煌	110
考古资料与契丹社会史研究	114
楼兰考古百年	118
汉代的家庭伦理	125
汉代骊(革干)城与罗马战俘无关	126
代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	132
海外汉学的奉献	134
中国神话的历史	138
古代游戏史	139
百年西夏学	141
理学之地位	145
成都平原古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154
三星堆是通向远古文明的大门	154
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源头	156
宝墩文化的文化特征	157
宝墩文化的古城址	158
宝墩文化——酋邦制的遗迹	158
“私学”及“私学弟子”	159
关于“私学”属于非国家正户	160
关于“私学”由逃亡户口产生	161
“私学弟子”也由逃亡户口产生	162
城市考古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163
朱熹格物致知论的科学精神及其他	170
宋朝职官制度的特点	178
克孜尔千佛洞：古龟兹与中国第二敦煌	189

唐末食人考.....	194
古代的“红衣大炮”.....	208
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	209
《永乐大典》还能否完整地重现于世.....	218
生态环境恶化是明灭亡主因之一.....	221
板桥越狱.....	222
我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225
我国古代货币的六次重大演变.....	227
中国古代宰相制度的演变.....	229
我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与发展.....	230
中国史上的大同、小康之说.....	235
古代翰林制度及其对封建文化的影响.....	239
如何理解明清是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	243
戊戌变法六问.....	245
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主要特征.....	249
明末清初民主思想与近代民主思想的关系.....	252
民族文化生命史观疏论.....	254
清前期文化的时代特征.....	269
徽州文化世家的形成及其特征.....	274
恤农为政事之本.....	277
封建社会“两种经济”此消彼长.....	279
康有为的“儒表西里”变法方式.....	281
梁启超的历史教学思想与实践.....	283
太平天国失败原因探析.....	290
天上神权，地上皇权——一个解不开的历史死结.....	290
地上天国，封建体制——产生腐败的温床和土壤.....	292
聚也上帝教，离也上帝教——宗教对太平天国的 巨大影响.....	294

目 录

得人则昌，失人则亡——洪秀全的孤家寡人政策.....	295
北伐西征，形同流寇——太平天国战略上的重大失误.....	297
不修德政，治国无章——洪秀全等人治国政策的检讨.....	298
清朝的满蒙联姻.....	300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凡研治“依据时间以为变迁”之学科，无不分期别世以御纷繁。地质史有“世纪”、“期”、“代”之判，人类进化史有“石世”、“铜世”、“铁世”、“电世”之殊。

若此类者，皆执一事以为标准，为之判别年代。一则察其递变之迹，然后得其概括；一则振其纲领之具，然后便于学者。通常所谓历史者，不限一端，而以政治变迁、社会递嬗为主体试为之解，则人类精神之动作，现于时间、出于记载为历史；寻其因果、考其年世、即其时日之推移，审其升沉之概要，为历史之学。历史学之所有事原非一端，要以分期为之基本。置分期于不言，则史事杂陈，燮然淆乱，无术以得其简约，疏其世代，不得谓为历史学也。世有以历史分期为无当者，谓时日转移无迹可求，必于其间斫为数段，纯是造作。不知变迁之迹，期年记之则不足，奕世计之则有余，取其大齐以判其世，即其间转移历史之大事，以为变迁之界，于情甚合，于学甚便也。西洋历史之分期，所谓“上世”、“中世”、“近世”者，与夫三世之中所谓 Subdivisions 在今日已为定论，虽史家著书小有出入，大体固无殊也。返观中国论时会之转移，但以朝代为言，不知朝代与世期，虽不可谓全无关涉，终不可以一物视之。今文春秋有“见闻”、“传闻”之辨，其历史分期之始乎春秋，时代过短，判别年限又从删述者本身遭际而言，非史书究义，后之为史学者，仅知朝代之辨，不解时期之殊，一姓之变迁，诚不足据为分期之准也，日本桑原*藏氏著《东洋史要》(后改名

《支那史要》),始取西洋上古、中古、近古之说,以分中国历史为四期,近年出版历史教科书,概以桑原氏为准,未见有变更其纲者。寻桑原氏所谓四期,一曰上古,断至秦皇一统,称之为汉族缔造时代。二曰中古,自秦皇一统至唐亡,称之为汉族极盛时代。三曰近古,自五季至明亡,称之为汉族渐衰、蒙古族代兴时代。四曰近世,括清一代为言,称之为欧人东渐时代。似此分期,较之往日之不知分期但论朝代者,得失之差,诚不可量。然一经中国著史学教科书者尽量取用,遂不可通。桑原氏书虽以中华为主体,而远东诸民族自日本外,无不系之,既不限于一国,则分期之谊,宜统合殊族以为断,不容专就一国历史之升降,分别年世,强执他族以就之。所谓汉族最盛时代、蒙古族最盛时代、欧人东渐时代者,皆远东历史之分期法,非中国历史之分期法。中国学者强执远东历史之分期以为中国历史之分期,此其失固由桑原,又不尽在桑原也。且如桑原所分尤有不可通者二端,一则分期标准之不一,二则误认历来所谓汉族者为古今一贯。请于二事分别言之。凡为一国历史之分期者,宜执一事以为标准,此一事者一经据为标准之后,便不许复据他事别作标准,易词言之,据以分割一国历史时期之标准,必为单一,不得取标准于一事以上。如以种族之变迁分上世与中古,即应据种族之变迁分中世与近世,不得更据他事若政治改革、风俗易化者以分之。若既据种族以为大别,不得不别据政治以为细界,取政治以为分本者,但可于“支分”中之(Subdivision),不容与以种族为分别者平行齐列。今桑原氏之分期法,始以汉族升降为别,后又以东西交通为判,所据以为分本者,不能上下一贯,其弊一也。

中国历史上所谓“诸夏”、“汉族”者,虽自黄唐以来立名无异,而其间外族混入之迹,无代不有。隋亡陈兴之间,尤为升降之枢纽。自汉迄唐,非由一系。汉代之中国,与唐代之中

国，万不可谓同出一族，更不可谓同一之中国。取西洋历史以为喻，汉世犹之罗马帝国，隋唐犹之察里曼。后之罗马帝国名号相行，统绪相传，而实质大异。今桑原氏混其代谢之迹，强合一致名曰“汉族极盛时代”，是为巨谬(说详次节)，其弊二也。凡此二弊，不容不矫。本篇所定之分期法，即自矫正现世普行桑原氏之分期法始。

以愚推测所及者言之，欲重分中国历史之期世，不可不注意下列四事：

- (四) 宜知中国所谓汉族于陈隋之间大起变化唐虞三代以至秦汉，君天下者皆号黄帝子孙，虽周起岐汭，秦起邠渭，与胡虏为邻，其地其人固不离于中国。故唐虞以降，下迄魏晋，二千余年间，政治频革，风俗迥异，而有一线相承，历世不变者，则种族未改是也。其间北狄南蛮，入居边境，同化于汉族者，无代无有。然但有向化而无混合，但有变夷而无变夏，于汉族之所以为汉族者，无增损也。至于晋之一统，汉族势力，已成外强中干之势。永嘉建兴之乱，中原旧壤，沦于朔胡，旧族黎民，仅有子遗，故西晋之亡，非关一姓之盛衰，实中原之亡也。重言之，周秦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亡也，所幸者，江东有孙氏。而后缔造经营，别立国家；虽风俗民情，稍与中原异质，要皆“中国之旧衣冠礼乐之所就，永嘉之后，江东贵焉”，为其纂承统绪，使中国民族与文化，不随中原以俱沦也。江东之于中原，虽非大宗，要为入桃之别子；讫于陈亡，而中国尽失矣。王通作《元经》书陈亡而具晋宋齐梁陈五国，著其义曰：“衣冠文物之旧……”

君子与其国焉，曰犹我中国之遗民也。”（《元经》卷九）故长城公丧其国家，不仅陈氏之亡，亦是江东衣冠道尽（改用陈叔宝语）。江东衣冠道尽，是中国之亡，周秦汉魏所传之中国，至于建兴而丧其世守之域，至于祯明而亡其枝出之邦。祯明之在中国，当升降转移之枢纽，尤重于建兴，谈史者所不可忽也。

继陈者隋，隋外国也。继隋者唐，唐亦外国也。何以言之？君主者，往昔国家之代表也。隋唐皇室之母系，皆出自魏虬，其不纯为汉族甚明。唐之先公曾姓大野，其原姓李氏而赐姓大野欤？抑原姓大野而冒认李姓欤？后人读史，不能无疑也。此犹可曰一姓之事，无关中国也。则请举其大者言之，隋唐之人先北朝而后南朝，正魏周而伪齐陈，直认索虬为父，不复知南朝之为中国，此犹可曰史家之词，无关事实也。则请举其更大者言之，隋唐将相，鲜卑姓至多，自负出于中国甲族之上，而皇室与当世之人，待之亦崇高于华人。此犹可曰贵族有然，非可一概论也。则请举其民俗言之，琵琶卑语胡食胡服（见《颜氏家训》《中华古今注》等书），流行士庶间，见于载记可考者甚繁，于此可知隋唐所谓中年，上承拓拔宇文之遗，与周汉魏晋不为一贯，不仅其皇室异也，风俗政教固大殊矣。为史学者不于陈亡之日分期判世，而强合汉唐以一之，岂知汉唐两代民族颇殊，精神顿异，汉与周秦甚近，而与唐世甚远，唐与宋世甚近，而与南朝甚远，此非以年代言也，以历朝所以立国所以成俗之精神察之，然后知其不可强合。今吾断言曰，自陈以上为“第一中国”，纯粹汉族之中国也；自隋至宋亡为“第二中国”，汉族为胡人所挟，变其精神别成统系，不蒙前代者也。

（二）宜知唐宋两代有汉胡消长之迹，南宋之亡，又为中国历史一大关键。自隋迄宋，为“第二中国”，既如上所述矣，此八百年中，虽为一线相承，而风俗未尝无变，自隋至于唐季，（五代之名甚不可通，中原与十国地丑德齐，未便尊此抑彼，其时

犹是唐之叔世，与其称为五季，不如称为唐季，可包南北一切列国，说详拙著札记。)胡运方盛，当时风俗政教，汉胡相杂，虽年世愈后，胡气愈少，要之胡气未能尽灭。读唐世史家所载，说部所传，当知愚言之不妄也。至于周末胡气渐消，以至于无有，宋三百年间，尽是汉风，此其所以异于前代者也。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惟有取而合之，说明之曰“第二中国”，上与周汉魏晋江右之中国对待，分别可也。此“第二中国”者，至于靖康而丧其中原，犹晋之永嘉；至于祥兴而丧其江表，犹陈之祯明；祥兴之亡，第二中国随之俱亡，自此以后，全为胡虏之运，虽其间明代光复故物，而为运终不长矣。祥兴于中国历史之位置，尤重于祯明，诚汉族升降一大关键也。

(三)宜据中国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分期之标准如上所云，“第一中国”、“第二中国”者，皆依汉族之变化升降以立论者也。陈亡隋代，为汉族变化之枢纽，宋亡元代为汉族升降之枢纽，今为历史分期，宜取一事以为标准，而为此标准者，似以汉族之变化升降为最便。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诚以历史一物，不过种族与土地相乘之积。种族有其种族性或曰种族色者(Racial colour)，具有主宰一切之能力。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今取汉族之变化升降，以为分期之标准，既合名学“分本必一之说”，又似得中国历史上变化之扼要，较之桑原氏忽以汉族盛衰为言，忽以欧人东渐为说者，颇觉简当也。

(四)宜别作“枝分”(Subdivision)勿使与初分相混如上所言，既以汉族之变化与升降，为上世、中世、近世分期之标准，而每世之中为年甚长，政俗大有改易，不可不别作“枝分”，使之纲目毕张。兹以政治变迁为上世枝分之分本，风俗改易为中世枝分之分本，种族代替为近世枝分之分本，合初分与枝分图为

下表而说明之：

中国历史甲上世(一)上世第一期周平王元年以前。(二)上世第二期起周平王元年至秦始皇二十六年。(三)上世第三期起秦始皇二十六至晋建兴五年。乙中世(四)上世第四期起晋建兴五年至陈祜明三年。(五)中世第一期起陈祜明三年即隋开皇九年后至后周显德六年。(六)中世第二期起宋建兴元年即显德六年之次年至祥兴二年。丙近世(七)近世第一期起宋祥兴二年即元至元十六年至至正二十四年。(八)近世第二期起元至正二十四年即韩氏龙凤十年至明永历十五年。(九)近世第三期起明永历十五年即清顺治十八年至宣统三年。

丁现世—民国建元以来。说明上世、中世、近世之所由分，与中世第一、第二两期之所由分，俱详前。周平王东迁以前，世所谓唐虞三代，此时期中虽政治不无变化，而其详不可得闻，既无编年之史，(竹书纪年不足信。)又多传疑之说，(夏殷无论，即如两周之文王受命周公居东厉王失国诸事，异说纷歧，所难折衷。)惟有比而同之，以为“传疑时代”，盖平王以降，始有信史可言也。东周数百年间，政治风俗，上与西周有别，下与秦汉异趣，其时学术思想昌明，尤为先后所未有，故自为一期。

上古第三期，括秦汉魏西晋四朝，为其政治成一系也。上古第四期，括东晋宋齐梁陈五朝，为其政治成一系，风俗成一贯也。近世第一期，括蒙古一代，第二期括明朝始终，第三期括满清一代，近世独以朝代为分者，以朝代之转移，即民族势力之转移故也。分世别期，最难于断年，前期与后期交接之间，必有若干年岁为过渡转移时代，合于前世既觉未安，合于后期更觉不可，今为画一之故，凡过渡时代均归前期，如上世中世之交，有数朝为过渡转移期，全以归于上世，必于陈亡之后，始著中世。又如上古第一期与第二期之交，周赧入秦，与始皇一统间，数十年为过渡期，今以附于第一期，必俟六国次第以

亡，然后著第二期。一切分期，除近世第一期外，俱倣此。近世第一期所以独为例外者，以元人入中国与往例不同，未入中国时，固在朔漠号称大汗，既揷出之后，又复其可汗之名，此于中国纯为侵入，故第一第二期间，以吴始建国为断，不以顺帝北去为断。

分中国历史为如是三世，固觉有奇异之感焉，则三世者，各自为一系，与上不蒙而上世中世又有相似之平行趋向是也。北魏北周第二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辽金第三期之缔造时与上不相蒙者也，中世之隋唐，犹上世之秦汉，同为武功极盛之世。隋之一统与秦之一统，差有相似之点。中世之北宋，犹上世之魏晋，同为内政安人、外功不张之世。中世之南宋，犹上世之江左，同为不竞之世。南宋之亡，尤类陈亡，此上世中世平行之趋向，不待详言者也。中世与近世趋向绝殊，固由承宇文者为隋代，完颜者为元辽，与魏晋与周已不可强同，元隋更大异其性，此后之历史遂毫无相似者矣。简言之，上世一系之中，所有朝代，但有相传而无相灭；中世一系之中，亦但有相传，而无相灭；近世一系之中，但有相灭，而无相传，是非以帝族言也。以其立国之道察之，如是云尔。

余为此分期法，读者宜有所疑，以谓“梁陈不竞半虏之隋唐代承统绪，本汉族甚不名誉之事，如今日通行之分期法合汉唐而一之，此丑可掩，今分而为二，非所以扬历史之光荣也。”余将答此说曰，学问之道，全在求是，是之所在，不容讳言其丑。今但求是而已，非所论于感情。余深察汉唐两代实不能比而同之，纵便违心徇情，比而同之，读史者自可发觉，欺人无益也。陈隋间之往事，曷尝不堪发愤，要不可与研究史学之真相混合言之。

早期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新进展

在人类早期发展史上，发生过两次重大转折，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一次是学会控制火，从此人类便获得了光明、温暖和熟食；另一次则是食物的生产，从此人类社会由攫取性经济向生产型经济转变，进入了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新时代。食物生产大致发生于全新世的初期，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长期以来，我国对这时期的文化遗存不甚明了，近十多年来，这方面的考古学研究获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主要是发现并确认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出土了一批这一时期的遗物。

目前发现属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有分布。

重要的有河北徐水南庄头、北京门头沟东胡林、怀柔转年、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邕宁顶蛸山、桂林甑皮岩、柳州鲤鱼嘴、广东阳春独石仔、翁源青塘、封开黄岩洞等。这些遗址的发现及其研究的深入，对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范围、栽培农作物的起源，以及陶器、磨制石工具、营建居所等的起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受考古发现的局限，最初是将仰韶文化以前(约距今7000年)至地质年代上的全新世的开始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早期。近十多年的研究表明，距今9000~7000年间，是我国原始农业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在黄河流域、长江中游、辽河流域等自然地理环境较为优越的地区，普遍发现了经济生活较为稳定的聚落遗址。当时的南方种植了稻，北方种植了粟，都饲养了家畜与家禽，精神文化生活内容

开始丰富起来，适用于农业定居生活的一些发明和创造产生在这一时期。考古学界据此推断，这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当已脱离了原始农业发生和最初的发展阶段，所以，应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分离出来，作新石器时代中期。同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现了近一万年的文化遗存，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则发现了距今 1 万年或接近 12000 年的古栽培稻遗存。据此，考古学界认为可将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年代，大致确定在距今 12000 年至 9000 年这一范围内。

我国古代的主要粮食作物是稻与粟。1977 年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地下粟粒仓储的发现，确立了华北地区是粟类农作物的发生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距今 9000 年以前的栽培粟遗存，也许粟粒不易保存而难以发现，或初期的栽培粟粒与野生粟粒不易区别，早期栽培粟遗存的发现是个至今尚无法突破的考古难题。但是，依据徐水南庄头发现的可能是家畜的狗与猪骨骼及其由潮湿转干的湖沼演变这一适合于植物栽培的环境特点、北京东胡林发现的人骨已轻度石化的两男一女的三人合葬墓、怀柔转年出土的盛物石容器等全新世初期的遗存推测，大约在距今 1 万年前后，栽培粟在太行山东西两侧及燕山南麓的山谷平原地带发生。栽培稻的起源，因 1993、1995 年分别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 1 万年前后的栽培稻植硅石和稻谷而开始明朗起来。这两处遗址的地理位置处于长江中下游之间的江西东北部的环玉山至南岭北麓，大约是我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在这一地区内，丘陵、盆地、平原、河流及湖泊相间分布，气候湿润，可食性野生动植物丰富，适于人类从事较为稳定的采集(包括捕捞)、狩猎活动。

在这两处遗址中与古栽培稻遗存同时发现的还有大量野生稻遗存，表明栽培稻是在长期采集食用野生稻的过程中逐渐发生的。其发生地大概在这两处遗址所属的南丘陵及其以南、武

夷山以西、雪峰山以东、南岭岭脊以北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如果结合洞庭湖西北部发现的距今 8000 多年的彭头山文化的上万粒栽培稻谷及其聚落遗址、杭州湾南部发现的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的成堆成片栽培稻遗存及其发达的农业工具与木结构房屋,以及河南南部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距今 8000 年前的栽培稻遗存,可以简略地推论栽培稻起源和稻作农业早期发展的形式:即栽培稻大约在距今 1 万年前或接近 12000 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距今 9000 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的北进,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简称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

使用陶器、制作磨光石工具、营建房屋及村落,是考古学上所见我国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它们的起源,应当与食物生产的起源与发展及相对稳定的定居生活有关,自然也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或更早的遗址中探寻。

目前发现的距今 9000 年以前的陶器或陶器碎片,有 10 来个地点,如北京怀柔转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阳原于家沟、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广西桂林甑皮岩、庙岩、柳州鲤鱼嘴、邕宁顶蛸山、广东翁源青塘等。这些遗址发现的陶片通常比较厚,烧制温度较低,陶泥中大都夹有石英、云母末或蚌末,有的断面有层理现象,似乎是一层层贴敷制作的,器型有罐与 类,其中在道县玉蟾岩发现的一堆陶片复原为一个尖圆底斜腹直口罐,显示出极为原始的状态。推测这些陶器残片,应是我国陶器起源阶段的产品。从玉蟾岩遗址复原的那件陶罐的埋藏年代早于古栽培稻谷、华北阳原于家沟的陶片发现于距今 1 万多年的细石器文化层中以及江西万年仙人洞、广西桂林庙岩发现的陶片的年代可早至约距今 14000 年等现象分析,我国陶器的起源,很可能是在栽培作物发生之前,但与栽

培作物发生的社会经济背景相同，也是在发达的采集经济下逐步诞生的。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发现的磨光石工具，数量较少，且大都磨制较为粗糙，器型有磨盘、磨棒、穿孔加重器、斧等。近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石器磨制技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产生，在石器的刃部或局部磨光。如河北玉田孟家泉、阳原籍箕滩发现的刃部磨光的锛状器，阳原虎头梁有粗磨痕迹的凹底尖状器，广西柳州白莲洞二期的磨刃切割器等。这种仅刃部磨光的石工具，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中也有发现，如广东阳春独石仔的磨刃切割器、广西柳州鲤鱼嘴的磨刃斧、锛等，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磨刃石工具的延续及技术的发展。这类仅在刃部磨光的石工具的作用，主要是用于切割。由此推测，石工具的刃部磨光现象，最初可能是在作用于切割磨擦过程中形成的。磨光石工具的起源可能就缘于此。所以，石器磨制技术应是在手工作业下产生的。考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磨制石器的型制，它们都不是作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工具，其中石磨盘、磨棒是用于加工食物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可用于农作物生产的工具，很可能是那些遗址中出土的穿孔蚌器、骨角器或已不能再现的竹木器。磨制石器作为原始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工具，可能是在农作物生产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所，目前发现的主要是洞穴，如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等，是天然的居所。这种择洞而居，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以来人类对天然居所的最佳选择，但限制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仙人洞与玉蟾岩洞穴可用于人类生活的范围都较小，在此生活的人口，估计为一个家庭或一个微型氏族。徐水南庄头遗址面积较大，在其活动的人口自然应多一些。在已发掘的约 300 平方米范围内，发现了两座灰坑、四条沟和两处用火遗迹等，